

中国与边缘市场合作的风险与对策

徐秀军

内容摘要：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赋予边缘市场新的内涵与角色。当前，重视与中东、拉美、非洲和欧洲发展中国家等边缘市场合作，既是中国应对发达国家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选择，也是中国参与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支撑。边缘市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存在的问题和拥有的优势不尽相同，加之外部世界的各种风险与不确定性，与边缘市场合作面临诸多障碍与风险。为此，与边缘市场合作必须树立风险意识，将防范风险放在政府战略规划和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位置，不断提升市场合作主体的风险防范和应对能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边缘市场 “走出去” 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052 (2018) 06-0120-07

近年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逆全球化”思潮日益盛行，不仅给经济全球化进程蒙上了新的阴影，也给中国传统上以绑定欧美主流贸易市场为主的对外开放思路增加了变数。尤其是2018年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更是凸显中国在技术、人才和产业链方面对欧美市场的高度依赖所带来的风险。在此背景下，重视与中东、拉美、非洲和欧洲发展中国家等边缘市场合作成为中国应对发达国家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选择，也是中国参与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支撑。

一、边缘市场：概念界定与新的角色

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较早从“中心-边缘”视角系统地阐述世界体系理论。1974年，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一书中提出，世界体系的经济基础来自跨国和跨区域的劳动分工，世界各国也因此被划分为中心国家(core countries)、半边缘国家(semi-periphery countries)和边缘国家(periphery countries)；中心和边缘国家的形成源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不断扩张，一些相对孤立和落后的地区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通过不等价交换为资本主义的运行和资本的积累提供保障的同时不断被边缘化。这为人们认识“边缘市场”的概念提供了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体系的演进也不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的扩张，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高度相互依赖赋予边缘市场新的内涵与角色。

(一) 边缘市场的概念

“边缘市场”(Marginalized Markets)是比“边缘国家”外延更加广泛的概念。在主体范围上，它既可以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也可以是一个跨越国家或经济体的国际区域，甚至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内部的区域。总体来说，边缘市场是相对中心市场而言的一个概念，并且与经济全球化紧密相连。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些经济基础条件相对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逐步成为了全球化的主导者，占据全球价值链

收稿日期：2018年10月5日

作者简介：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亚太区域合作。北京，100732。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暨教育部战略基地2017年重大招标课题“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路径及其实践研究”(编号：17ZDA26)的资助。

的高端，主导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因而被称为中心市场。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则是被动融入全球化，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较低地位，并成为全球经济规则的接受者，因而被称为边缘市场。

从内部因素来看，边缘市场在物产、制度和理念等方面存在相对弱势。边缘市场的物质生产相对落后，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人均收入相对较低。对于一些国家和地区而言，主要缘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贫乏的自然资源；而对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即便资源禀赋较好，但并未转化为相应的经济实力。在制度方面，边缘市场的经济制度不健全，经济体系建设不完善。这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并给产出效率的提升带来负面影响。在理念上，边缘市场的经济发展理念和模式往往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阻碍力量之一。

从外部因素来看，边缘市场是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逐步塑造形成的。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相对孤立的世界，尽管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存在很大差异，边缘市场与中心市场的划分亦无从说起。因此，边缘市场的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维度来考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技术进步使交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因此成为各类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主导者。对于一些无力主导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来自外部的强大的全球化驱动力使它们不得不纳入全球分工体系，并加入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支配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环节，并成为全球价值链条上最为基础的一环。

由此可见，边缘市场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这说明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而言，边缘市场既不是受某一特定因素影响的“诅咒”，更不是一个不能改变的“标签”。同时，这一概念也用于描述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类市场主体。在发展阶段上，边缘市场主要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地区分布上，边缘市场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

（二）全球化时代的边缘市场

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边缘市场的产生，但也正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它们的全球价值才得以挖掘和体现。在全球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今天，边缘市场并非处于全球经济体系的边缘。中心市场与边缘市场的作用不是主次之分，而必须用“扁平化”的视角看待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工。并且，边缘市场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独特作用，并且随着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这种作用日益强化。

首先，边缘市场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边缘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长期以来，总体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并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主要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1988—2017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的平均值为4.9%，比发达经济体高2.5个百分点。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10年中，两者之间的经济增速差进一步扩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的平均值为5.1%，比发达经济体高3.9个百分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16年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货物贸易总额达14.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份额为44.8%，在过去30年中上升了18.5个百分点。

其次，边缘市场是全球价值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为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奠定了基础。由于边缘市场较多，其可替代性使其作用受到抑制，但作为一个整体，其地位与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总体来看，边缘市场劳动力成本低、自然资源丰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数达62.5亿，占全球的份额为84.0%；土地总面积为9471.6万平方公里，占全球份额的73.0%。^①为此，一些中心市场将生产线移到拥有廉价劳动力的边缘市场，并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边缘市场买入原材料。在此过程中，中心市场企业增强了竞争力，发展空间不断拓展；一些奉行开放战略的边缘市场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收入和消费能力不断提升，并带动经济持续发展。

再次，边缘市场的经济崛起增加了中心市场政策的“回荡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边缘市场的经济总量不提增加，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上升。IMF数据显示，2017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以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达31.73万亿美元，与发达经济体经济总量之比为65.7%，较20年前提升了38.1个百分点。2008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发达

经济体，达 42.86 万亿国际美元，为发达经济体经济总量的 1.05 倍；2017 年，前者为后者的 1.42 倍；预计 2020 年将继续上升至 1.53 倍以上。在此背景下，中心市场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边缘市场的影响不再是单向的，边缘市场的政策回应成为中心市场制定政策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二、边缘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与优势

边缘市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并且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和拥有的优势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当前边缘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特点与优势主要体现以下四个方面：

（一）资源禀赋有比较优势，但缺乏释放经济发展潜力的条件和机制

稳定的资源供应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资源不足将会束缚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多中东、拉美、非洲以及欧洲发展中国家都拥有丰富能源和矿产资源。以石油储量为例，在 2016 年全球排名前十的国家当中，除了加拿大，其他 9 个均属于边缘市场，依次为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俄罗斯、利比亚和尼日利亚，其石油储量占全球的份额达 74.9%。边缘市场也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同时，边缘市场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多数国家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可见，边缘市场拥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等促进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并且政治与市场机制不完善，资源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如何破解“资源诅咒”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然是边缘市场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经济增长总体较快，但制约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因素日益凸显

金融危机前的很长时间里，边缘市场国家经济总体保持较快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近年来受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外需持续低迷、投资增速放缓、宏观政策空间收窄和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等短期因素以及低端技术进步应用与扩散的效应下降、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制度性障碍等长期因素的影响，边缘市场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势头有所减缓，并且分化日益加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数据，金融危机爆发前的 2007 年，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独联体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与北非地区^②、拉美与加勒比地区、欧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 11.2%、9.0%、6.8%、5.6%、5.6% 和 5.1%，同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仅为 2.7%；2017 年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6.5%、2.1%、2.7%、2.2%、1.3% 和 6.0%，同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 2.3%（见图 1）。边缘市场经济增速整体放缓态势十分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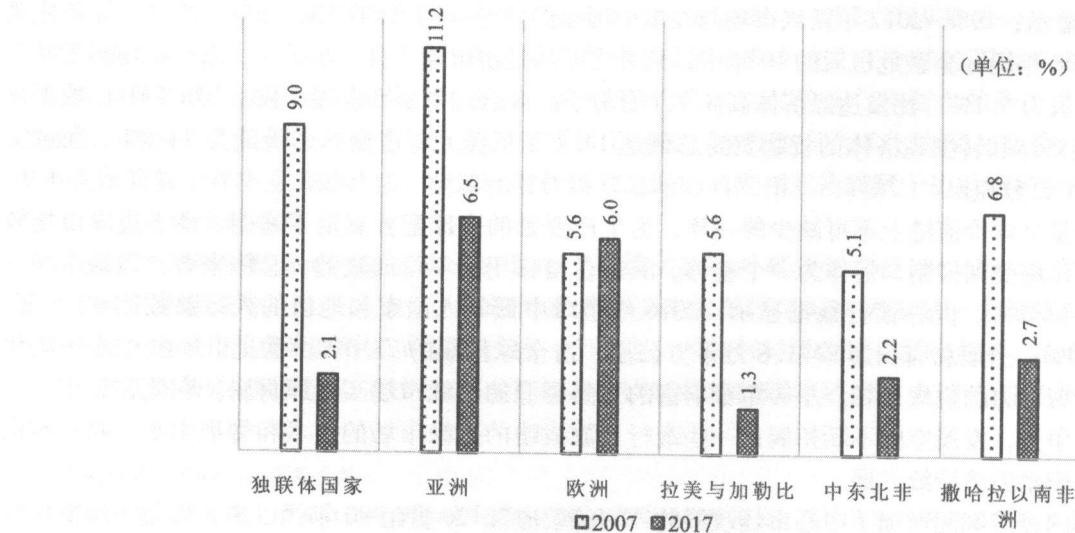


图 1 2007 年与 2017 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对比

资料来源：IMF。

（三）市场需求相对旺盛，但较为单一的经济结构难以满足市场要求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边缘市场国家国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新兴中产阶级规模日益庞大，居民的日常消费支出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很多边缘市场国家正成长为消费型社会。以非洲为例，未来10年内，拥有可支配收入的非洲家庭数量将达到1.28亿户，2030年非洲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50%，这将构成非洲庞大的消费群体；2020年，非洲中产阶级消费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万亿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0%。但由于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边缘市场国家的其他产业发展受到了阻碍，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国内的生产能力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扩大国内市场，促进产业的多元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已成为多数边缘市场国家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边缘市场的众多国家要转型为多元化经济，还要经历很漫长的过程。

（四）对外合作愿望强烈，但相对恶劣的营商环境严重影响合作成效

边缘市场都属于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人才储备相对有限。为了突破发展瓶颈，多数边缘市场国家都希望通过加强对外合作获取开发能源资源、开拓潜在市场的资金和技术。世界银行研究显示，2020年前，全球发展中国家每年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约为1万亿美元，而现有的多边机构的贷款规模远远不能满足这些国家的需求。并且，发展中国家有借贷需求的人中，只有1/5的人能得到贷款，其他都是通过民间借贷或者地下钱庄获得资金。边缘市场国家的技术研发以及创新能力同发达国家甚至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当前，边缘市场在高端技术领域高度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的基本格局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二者之间的“技术鸿沟”仍在继续加深。为此，很多边缘市场国家在多边和双边场合都表达了强烈的对外合作愿望。但是，由于缺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必需的良好政治环境和营商环境，一些国家对外合作的成效仍处于较低层次。

三、中国与边缘市场合作面临的障碍与风险

近年来，由于受高位攀升的债务水平以及日益盛行的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理念和行动上，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战略在一些边缘市场出现了收缩迹象，并不得不减少对边缘市场的投入。为此，边缘市场也在全球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和替代支持力量。这为中国进入边缘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总体来看，当前中国与边缘市场合作仍面临诸多障碍与风险，并且一些障碍和风险在部分国家还表现得十分突出。具体来说，这些障碍与风险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一）边缘市场保护主义政策致使市场准入难度增加

由于市场脆弱性，担心经济受外部市场的影响以及应对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盛行的保护主义，很多边缘市场国家抵制对外开放，推出各种贸易、投资和产业保护措施，并加大了对外国企业的审查和调查，例如环保审查、反垄断审查、反商业贿赂调查、国家安全审查、反倾销调查、技术审查以及信息披露方面的调查等。当前，中国已成为很多边缘市场国家的最大或重要的贸易伙伴国。随着中国与边缘市场贸易越来越密切，边缘市场准入的技术性贸易和投资措施也日益严苛。市场的相对封闭和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中国进入相关国家和地区市场的难度增加。

（二）边缘市场政局不稳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过去一年，全球部分国家出现了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边缘市场首当其冲。尤其是中东等热点地区，局部冲突持续不断，政治动荡频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民族矛盾、宗教纠纷、边界问题以及西方大国干涉等因素相互交织，新老热点此起彼伏，并且这些问题在短期内都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动荡的政治环境和复杂的社会问题不仅分散了相关国家推进经济社会建设的精力，也影响了政策的延续性，从而使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开展合作充满了不确定性。报告显示，东道国的战争和内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后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2005至2014年发生的120起“走出去”失败案例中，有25%是因为政治原因所致，有8%的投资事件在审批环节因东道国政治派系力量的阻挠而失败，还有17%是在运营过程中因东道国政治动荡领导人更迭等原因而遭受损失。

（三）边缘市场社会不安全大幅推高了当地运营成本

在边缘市场的部分国家中，抢劫、绑架勒索、武装人员袭击、恐怖主义活动等问题时有发生。随着边缘市场的中资企业日益增加，中资企业在海外安保方面遭受损失的案件数量也在快速增加，企业的安保成本也不断上升。据外交部领事司统计，2015年外交部领保中心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受理的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数量达86678件，其中领事保护案件31144件，领事协助案件55534件，共涉及中国公民95860人，造成1928人死亡。其中，涉及中资企业的案件占绝大多数，并且绝大多数案件发生在边缘市场。安保支出成为中国与边缘市场合作的主要额外成本，中资企业的一些项目甚至因此被迫中止或撤出东道国。

（四）边缘市场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影响市场对接进程

在边缘市场国家中，绝大多数都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政治发展进程起步较晚。在实现民族独立后，很多国家脱离国情延续了宗主国设计的政治体制，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出现失衡。并且，由于多数边缘市场国家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缺乏现代沟通的封闭环境中，人们的时间、效率观念比较淡薄，并且长期的殖民政策导致普通民众和中低层行政人员办事往往缺乏长远眼光，并成为政府政策的制订和贯彻的重要掣肘因素之一。中资企业一贯奉行和追求的“中国速度”不得不在这些国家中放慢节奏。此外，由于行政效率低下，官员寻租腐败、收钱办事也便有了空间。

（五）边缘市场法律法规与市场制度不健全频繁引发民事纠纷

由于边缘市场国家法律法规与市场制度不健全，外国投资者的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劳资纠纷频繁发生。在非洲、东欧和中东地区，东道国对境外投资项目有较高的本地化要求。根据《2015年度中国企业“走出去”调研报告》，83%的受访企业在“走出去”后，会选择聘用当地员工，且近半数的受访企业所聘用的当地员工占海外常驻员工总数的50%以上。但是在用工过程中，有21%的受访企业曾遭遇群体性劳资纠纷。其中，南美洲、非洲等边缘市场的群体性劳资纠纷比例较高。超过半数的受访企业有牵涉入当地民事诉讼程序，其中过半数的受访企业平均花费10万元-100万元的诉讼或仲裁费用。此外，由于税务操作未满足当地合规要求、当地政府的税收歧视、境外项目的税务管理混乱等原因，24%的受访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的运营中曾经遇到过税务争议。

（六）边缘市场宗教文化多样性导致市场开拓的复杂性

边缘市场宗教文化多样，并且存在宗教矛盾和文化冲突。一些国家宗教势力强大，世俗化程度较低，宗教力量往往强力干预世俗社会和市场行为。与此同时，在语言、风俗习惯、价值观、宗教信仰等方面，很多边缘市场国家与中国存在明显差异。由于宗教、文化和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对东道国缺乏了解，在边缘市场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与当地社会在文化交流与融合方面难免会发生摩擦，甚至冲突，并有可能成为当地民间排挤中资企业的导火索，从而引发大规模的抵抗活动。与一些拥有成熟市场的国家相比，边缘市场的多元文化和宗教势力使中国企业的市场开拓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如不注意相关知识的学习和风险的防范，企业经营活动很容易因此受到干扰，甚至被停止。

（七）边缘市场受外部大国控制加大了战略竞争风险

目前，西方大国仍对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的边缘市场国家保持较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例如，美国一直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外部力量，并视拉美为其“后院”；英国、法国、德国等前宗主国一直插手非洲事务，并一直谋求对前殖民地的控制和影响。近年来，主要西方国家面临严重的财政和债务问题，在边缘市场推行战略收缩，并减少了对这些国家的投入。但中国发展与边缘市场的经济关系、加大对边缘市场的资金投入仍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觉，中国与西方国家围绕开拓边缘市场的博弈日益加剧。并且，在部分国家和投资领域，双方的争夺日益显性化。一些外部大国因此直接或间接给中资企业进入边缘市场设置障碍，甚至发动当地民众破坏中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八）边缘市场的负面舆论助推对中国的防范和警惕心理

中国企业大规模走进边缘市场国家，打破了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道国利益集团的利益，挤占了当地企业的市场。利益上的冲突导致外部势力和东道国利益集团相互配合，利用和控制舆论发表防华排华言论，丑化中国政府和企业形象。一些国际舆论和媒体失实报道，使东道国政府

和民众增强了对中国的防范和警惕心理，并因此采取于中国企业不利的政策和措施。例如，以国家安全为由，部分国家借助政治手段阻止或干扰中国企业正当的投资经营活动；以保护就业和民族产业为名，部分国家的当地势力对中国企业的投资活动设置障碍。

四、中国防范边缘市场风险的对策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勾画出中国加强与边缘市场经济合作的新蓝图。如今，主要发达国家深陷严重的国内政治与社会问题，并且伴随保守主义势力抬头，对一些边缘市场国家的控制出现松动迹象。与此同时，边缘市场正在寻找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尽管全球经济仍在中低速通道艰难前行，但中国与边缘市场合作正迎来新的机遇期。但是，边缘市场多为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与边缘市场合作必须加强风险防控，发挥优势逐步做强做大。针对当前中国与边缘市场合作面临的障碍与风险，应从政府、企业和个人主体三个层面不断提升合作主体的风险防范和应对能力。

（一）政府主体：突出引导和保障功能

在政府方面，重点在于为企业与边缘市场合作营造良好的政治和投资环境。首先，与东道国保持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是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重要基础。其次，在企业“走出去”之前，推动与东道国商签政府间的投资保护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破除中资企业进入市场的制度性障碍，同时应与东道国政府和媒体保持密切联系，为中资企业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最后，在企业“走出去”之后，充分发挥中国驻外使领馆的领事保护和“窗口、桥梁、协调、辐射和服务”作用，及其向中资企业通报东道国安全风险预警，协助中资企业成立商会行会联合防范风险，为企业开展风险应对专题培训和经验交流提供支持。

在东道国的选择上，应引导企业优先进入政治与社会相对稳定、投资风险较小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边缘市场国家众多，风险状况和战略地位不一。为此，政府应引导企业优先进入政治与社会相对稳定、市场风险较低的国家，鼓励和支持企业优先进入拥有重要战略资源、占据重要地缘政治地位的战略支点国家。与此同时，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北非、南太等地区发达国家较少关注或正在退出的国家也是拓展边缘市场的重要选择。

在领域的选择上，应引导企业优先进入与社会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边缘市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多数国家拥有大量的贫困人口，迫切需要外资企业帮助改善民生。并且，由于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产业领域能够惠及多数民众，能够树立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良好形象，并由此建立中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利互惠关系。结合边缘市场的总体特点，医疗卫生、食品饮料、道路运输、房地产、旅游等领域存在较大市场空间。

（二）企业主体：提升投资决策和风险防范能力

在投资决策上，企业应重点在于加强市场调研，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边缘市场形势复杂，企业决策必须建立在对东道国市场有足够了解的基础之上。在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失误和项目失败的案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企业自身问题不无关系。很多中资企业没有建立战略规划部门或者市场调研人才缺乏，对外投资有时出于一时冲动，风险防范意识薄弱，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不强。为此，进入边缘市场前，企业要根据项目目标与特点开展调研，尤其是东道国的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度、社会治安、宗教文化、对华关系等投资环境，充分获取市场决策的可靠信息。

在经营风险防范上，企业应重视合资和合作经营模式，与其他合作主体共担风险。在边缘市场，遭受重大损失的中资企业或项目，多是中方全资或拥有的股份占绝对优势。这种投资方式在风险较高的边缘市场，一旦遭受损失，往往非常惨重。即便在获利时能够独享或分享绝大部分的利益，但也容易因此引发东道国企业和民众的觊觎和不满。而合资与合作经营不仅能分散风险，也有利于中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合资与合作的对象既包括东道国政府和企业，也包括在东道国有长期经营经验的西方大国公司。从中资企业在国外经营实践来看，部分收购西方国家在边缘市场的企业来开拓边缘市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选择。它既能化解西方国家以及东道国的防范心理，也有助于中资企业学习在边缘市场经营和管理企业的经验。

(三) 个人主体：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在个体方面，重点在于加强海外雇员的安全防范意识。企业应对每位赴海外劳务人员进行行前教育和培训，增强驻外员工的安全意识，提高安全警惕。教育员工尊重当地宗教文化习俗，不卷入当地政治争端或族群纠纷，密切关注当地政治动向并避免人员单独外出。在社会治安环境较差的国家，员工应当避免“露富”，与当地人交往时保持低调和谦和态度。与此同时，企业应加大对员工的安全投入，为雇员提供安全保障。例如，为员工缴纳保险金以及在生产、施工现场和生活驻地根据需要采取修筑高墙和铁丝网、深挖防护沟、安装报警和监控设备、雇用安保人员等安全防护措施。

总之，随着主流发达国家的政策转向、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演进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东、拉美、非洲和欧洲发展中国家等边缘市场在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加强与边缘市场合作将是未来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方向。但是，与边缘市场合作必须树立风险意识，将防范风险放在政府战略规划和企业投资决策的首位，同时在策略上要坚持“以点带面”、分清主次，同时倡导“利益均沾”、互利共赢，用实力和时间逐步开辟与边缘市场合作的广阔空间。

注释：

①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2018-03-01]。

② 统计上包括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参考文献：

- [1]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300-345.
- [2]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hallenges to Steady Growth [R]. October 2018.
- [3] 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 Beyond Austerity: Towards a Global New Deal [R]. 2017.
- [4] 2016年世界油气探明储量及石油产量估计值 [J]. 当代石油石化, 2017 (1): 50.
- [5] 苑基荣. 非洲逐步迈向消费型社会 [N]. 人民日报, 2014-03-26 (22).
- [6] The World Bank Group,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Post-2015, October 2013.
- [7] 路虹. 中企“走出去”政治风险走升 [N]. 国际商报, 2015-01-30 (A7).
- [8] 徐正源, 王昶. 试析中资企业“五位一体”海外安保机制的建设路径 [J]. 当代世界, 2016 (8): 73-76.
- [9] 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 律商联讯. 2015-2016 中国企业“走出去”调研报告 [R]. 2016.

(责任编辑 王媛媛)